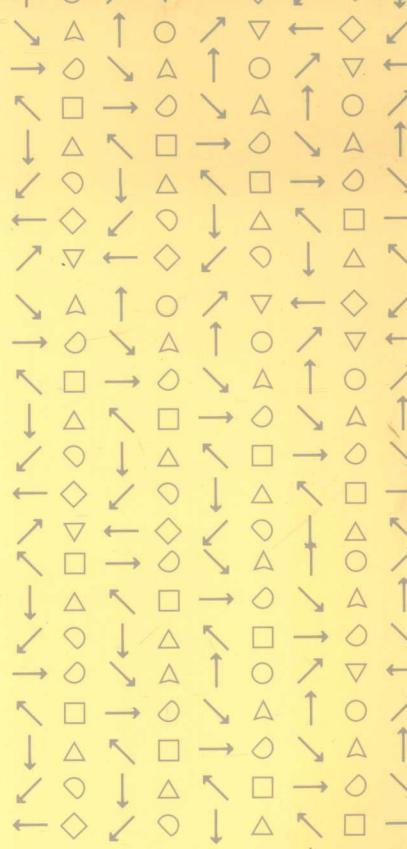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



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

当代经济学
教学参考书系

[美] 埃里克·弗鲁博顿 [德] 鲁道夫·芮切特 著
姜建强 罗长远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

[美] 埃里克·弗鲁博顿 [德] 鲁道夫·芮切特 著
姜建强 罗长远 译

当代经济学系
教学参考书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著;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

ISBN 978-7-5432-2513-8

I. ①新… II. ①弗… ②芮… ③姜… ④罗…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 IV. ①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3173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

[美]埃里克·弗鲁博顿 [德]鲁道夫·芮切特 著
姜建强 罗长远 译

出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插页 3

字数 513,000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513-8/F·832

定价:55.00 元

主编的话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200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厉所

2014年1月1日

致 谢

长期以来,许多个人和机构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帮助,对于他们在时间和资源方面所给予的慷慨资助,我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首先应该提及的是 University of Saarland。尽管该大学的财政预算非常困难,但是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并尽最大努力发展我们这一项目。这种帮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位于该大学并由本书作者主持的研究中心,一直是我们开展各种活动的一个稳定而重要的舞台。我们还得到来自以下个人或组织的重要资助:Minister of Education of the Saarland, President of the Landeszentralbank im Saarland (later Rheinland, Pfalz, and Saarland),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Volkswagen Foundation, Thyssen Foundation,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James L. West Chai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以及 Private Enterprise Research Center at Texas A&M University。在这些个人和机构的帮助下,研究中心举办了 12 次新制度经济学学术讨论会和 7 次暑期研修班活动。没有这些学术性活动,没有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的出版商 Georg Siebeck 持续不断的资助,本书将不可能呈现在读者面前。

尽管有着现代的通讯技术,但是仍然需要作者之间的个人会晤以及合作者之间的定期沟通。幸运的是,这些学术性交往由于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和 Thyssen Stiftung 的资助而变为可能。

这些资助使得弗鲁博顿(Eirik Furubotn)能够有机会与在 Konstanz、Jena、Trier 等地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同样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系为芮切特(Rudolf Richter)安排了多次访问机会,这使得他能够在美国各地拜访那里的学者,并对当今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活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在思考新制度经济学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受到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影响。因此,我们尤其希望向 Armen Alchian、Kenneth Binmore、Holger Bonus、Ronald Coase、Thrainn Eggertsson、Bruno Frey、Victor Goldberg、Herbert Hax、Christian Kirchner、Barbara Krug、Gary Libecap、Siegwart Lindenberg、Douglass North、Timothy Roth、Thomas Saving、Erich Schanze、Ekkehart Schlicht、Dieter Schmidtchen、Urs Schweizer 和 Oliver Williamson 表示感谢。就我们自己的贡献而言,本书完全是合作的结果。为此,我们在英文版使用名字的顺序是“Furubotn and Richter”,而在德文版中我们用的是“Richter and Furubotn”,以此避免字母次序上所产生的歧义。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 Barbara ThimmMaldener,他在 Saarbrücken 中心为各种活动的组织提供了许多帮助,并且还承担了大部分的文字打印工作。在大西洋彼岸,得克萨斯州的 Heidi Duckworth 为本书承担了重要的秘书和打印工作。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 Susanne Lipinsky 和 Teri Bush 也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埃里克·弗鲁博顿

鲁道夫·芮切特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ät of Saarlandes
66041 Saarbrücken Germany

前 言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新古典分析方法在主流学术领域中继续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当代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应该重新思考僵化的新古典假设的可接受性，并对制度在影响经济行为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重新予以评价。的确，这点尤其得到了强调，即制度应该被理解为需要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型框架下作出解释的内生变量。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的分析方法正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这种方法即便没有替代，也会对传统的新古典教条作出补充。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使用“无摩擦”的竞争模型和不完全竞争模型似乎不再具有合理性，因为这些模型是建立在零交易费用、完全个人理性和外生的给定制度结构这样一些严格的假定之上的。

在一般性的讨论中，“现代制度经济学”(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这种一般性术语是用来描述与制度问题存在关联的各种不同新理论分支。本书所讨论的也是这样一个较为宽泛的领域，不过，我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有时，它又被称作新组织理论(New Theory of Organization)。促使这一学派产生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就是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以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使用(和形成)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交易费用。或者，换一个略有不同的视角，我们可以说，产权配置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后果，而且，交

易费用会部分地影响到产权的分配和执行的方式。简而言之,将交易费用引入正統的生产和交换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在思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作出根本性的转换。

交易费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但是经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被认识到,似乎有点让人惊奇。然而,事实上,不仅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便是它们的各类批评者——比如德国历史学派、旧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以及最近的凯恩斯学派,都完全忽视了这一重大事实。当然,早期文献在不同地方曾经提到过“摩擦”的作用。我们可以在 John Stuart Mill(1857)以及后来的 Hicks(1935)所研究的货币经济学中看出这一点。然而,他们并没有在一般理论层面上对这一主题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Ronald Coase(1937, 1960)最早认识到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在制度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而且,这种一般性分析也使得我们在逻辑上更好地认识了产权分配在影响激励和经济后果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尽管 Coase 的这一认识所具有的重要性没有立即得到承认,但是 Coase 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最终还是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91)。他所“发现”的交易费用,不仅对许多经济学专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改变了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流行认识和研究方向。受到这种影响的领域包括,以 Douglass North(1981, 1990)为代表的经济史领域,以 Armen Alchian(1965a, 1965b)和 Oliver Williamson(1975, 1985)为代表的产业组织领域,等等。有趣的是, North 在 1993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 Robert W. Fogel 一起)。事实上, Coase 曾经提到,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会受到学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仅仅在说这句话的两年之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North 就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也可由以下事实看出:讨论现代制度问题的学术性期刊不断涌现出来;学术性会议上,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用来讨论这些问题,比如 1995 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

本书将新制度经济学理解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分析方法和合约理论的某种混合,并主要对这些领域的有关解释进行讨论。我们的目标是,对该领域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为 NIE 思想体系作出主要贡献的理论进行介绍,并予以批评性的评论。我们将尤其关注关系性合约或不完全合约,这些理论在真实世界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本书的读者对象既可以是那些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职业经济学家,也可以是那些为撰写毕业论文寻找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试图在前五章对有关 NIE 的不断增多的各色各样的文献进行归类,并解释如何将所讨论的多个理论线索放置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一般性结构中。在交待完这些背景材料之后,本书试图展示如何将现有的这些概念应用于三种基本制度类型——市场、企业和国家——的经济分析中。最后一章是一个展望,即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作者在 1983 年至 1994 年间组织举办了 12 次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现代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参加了这些会议,会议上的讨论激

发并孕育了本书。曾多次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 Armen Alchian、Ronald Coase、Douglas North 和 Oliver Williamson。这些大会的论文曾在 1983—1994 年间分别发表在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每年的第 3 期。作者在 1988—1994 年间还为欧洲的博士生组织了多次暑期研修班,本书中一些较为正式的讨论受到了开班期间所做工作的影响。合约理论是这些研修班的主要讨论内容,曾分别由 Benjamin Hermalin、Bengt Holmstrom、Paul Milgrom、Michael Riordan 和 Jean Tirole 讲授。

本书其实是由 R.Richter 和 E.G.Furubotn 撰写的 *Neue Institutionenökonomik* 的英文版,该书 1996 年由 J.C.B.Mohr(Paul Siebeck) 出版于 Tübingen。不过,在撰写英文版的过程中,作者利用这一修订机会扩充了一部分内容,吸收了一些新的文献,并进一步地明晰了一些新制度主义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因此,尽管没有作出根本性的变动,但是这部新著的确更为充分地反映了有关制度问题的讨论现状。

目 录

001	1 入门性知识
002	1.1 一些基本假设和术语
006	1.2 零交易费用的陌生世界
008	1.3 古典自由政府的理想模型
009	1.4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型
011	1.5 建构还是自发秩序?
012	1.6 加速看不见的手的运行
013	1.7 理性的不完全性
015	1.8 执行
016	1.9 政治过程
017	1.10 代理
018	1.11 制度的稳定性
019	1.12 再论情感
022	1.13 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制度主义
025	1.14 旧制度经济学的历史:一个注解
028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030	2 交易费用
031	2.1 交易费用的概念
032	2.2 交易费用:描述和尝试性定义
037	2.3 估猜交易费用的规模
041	2.4 模型化交易费用:“交易”活动
046	2.5 交易费用文献的一些评述

050	本章的阅读建议
051	3 绝对产权:有形物品的所有权
053	3.1 产权分析方法:一些基本概念
056	3.2 产权:阐释和尝试性定义
062	3.3 有形物品的财产:私产问题
071	3.4 公共资源
076	3.5 产权的起源
083	3.6 产权的经济分析:关于文献的一些评注
086	本章的阅读建议
088	4 相对产权:合约责任
089	4.1 合约责任的基本原则
092	4.2 多种类型的合约责任
102	4.3 合约理论的一些基本要素:来自经济学家的观点
107	4.4 三种合约理论
123	4.5 概要
124	4.6 合约法和合约行为的经济学:文献的一些评注
128	本章的阅读建议
130	5 合约原理
131	5.1 对即将讨论的合约理论模型的展望
132	5.2 企业的管理理论:开支偏好模型
135	5.3 委托—代理模型:道德风险
146	5.4 委托—代理模型:逆向选择
164	5.5 隐性合约
168	5.6 不完全合约模型
173	5.7 自我履约协议
178	5.8 回顾
181	5.9 关于正式合约理论的参考文献
190	本章的阅读建议
192	6 应用于市场、企业及国家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般性评论
193	6.1 私有经济的基本规则

195	6.2 对组织的一般性评论:企业、市场和国家
201	6.3 秩序和组织文献的简要指南
203	本章的阅读建议
205	7 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
205	7.1 作为组织的市场
206	7.2 关于价格刚性
208	7.3 作为市场合作结果的市场组织
211	7.4 新制度主义者关于市场组织的一些看法
225	7.5 市场:结论及展望
227	7.6 有关市场组织的文献的简要指南
230	本章的阅读建议
232	8 企业的新制度经济学
232	8.1 传统新古典理论
237	8.2 一体化激励
243	8.3 一体化的局限
246	8.4 所有权和控制
253	8.5 回顾性小结
255	8.6 新古典传统企业理论的制度模型
264	8.7 传统的苏联式企业
270	8.8 社会主义劳动管理型企业
280	8.9 劳资共管
291	8.10 企业的新制度经济学:先驱者及早期研究
292	8.11 企业的新制度经济学:概要及科斯之后的主要文献
295	本章的阅读建议
298	9 国家的新制度经济学
298	9.1 一个简单的国家新古典理论
301	9.2 政治制度的作用
303	9.3 政治市场
305	9.4 国际关系
310	9.5 关于国家和国际关系经济学的文献的简要指南
313	本章的阅读建议

314	10 新制度经济学的未来发展
316	10.1 作为新古典理论拓展的制度主义
318	10.2 初始方法的再思考
333	10.3 新范式的基础
342	10.4 现代制度主义:前进的机会
346	参考文献
388	译后记

入门性知识

如果将经济学转变成一种显学的计划能够成功,这将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但是,关于这个计划也存在一些悲观因素。

——Solow(1985, p.331)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是一个古老且有着内在合理性的认识。甚至严谨的新古典传统中的许多经济学家,比如 Marshall(1920, p.200),就已经认识到制度结构对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最近一些时期,随着新古典理论在技术性上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理论变得愈加抽象,制度现象却受到越来越少的关注。因此,在作为自 19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主流理论中(以福利经济学和 Arrow-Debreu 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制度实际上没有任何地位,重点是放在配置效率上,不同的制度性安排仅仅被视为满足帕累托最优所需的“替代方式”。

最优条件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含义,而是仅仅作为一种技术上的要求。它们既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或者任何其他“主义”。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是什么,只要让生产和资源配置满足于最优条件,它就可以使得所有国民的处境变得更好。(Lancaster, 1969, p.276)

从这种解释来看,微观经济学实际上是制度中性的,这一现状既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势,同时也说明了它的脆弱性。传统的分析方法是有益的,因为它让经济学家可以在一个完全信息和有预见力的理想特征化(ideal-typical)的条件下,揭示经济效率的基本问题。而且,即使没有任何制度分析,经济决策中相对价格的作用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说明。但是,现代理论确实存在很多的局限。它的脆弱性正是体现在它的制度中性分析方法上,也即没有严格地考虑制度约束和交易费用。因此,新古典经济理论只能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用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

当然,早期经济学家并非没有认识到新古典理论中所存在的缺陷。事实上,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批评者已经作为一种职业一直存在,这些批评者的影响在有些时候还相当大。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如 Roscher、Hildebrand 以及后期的 Schmoller,都对英国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正如 Commons 等一些美

国制度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对以边际主义、效用或利润最大化、对不同替代进行权衡等为基础的抽象理论基本上持反对态度。^①相比之下,现代制度经济学则是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以及更新的分析技术)来解释制度安排的运行和演化,从而拓展了微观经济学的适用范围,并提高了其预测能力。

1.1 一些基本假设和术语

如今被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在其产生之初仅仅作为了拓展新古典经济理论适用范围的一种努力。战后,对传统的生产和交换模型的不满以及批评与日俱增。不过,新制度主义的出现并非是何有意识地或者共同努力地发展出一种新理论的结果。尤其是,边际主义并没有被丢弃。它所做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一些关键假设作些修正。因此,尽管现代制度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与标准新古典分析方法是类似的,但是对于微观现象的分析,它具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特点。

下面一些概念和假设在现代制度经济学中尤其重要。

1.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为个人决策制定者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不同的,每个人均具有不同的以及变化的偏好、目标、目的和想法。因此含义上,“社会”、“国家”、“企业”、“政治派别”等等就不应被理解为行为上犹如个体行为者那样的集体。组织或者集体在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关注焦点。相反,一种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首先应该由个体成员的认识和行为出发,并将对它的解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这些个体成员的行为产生了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

2. 最大化 个体被假定能够观察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并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追逐他们的自身利益,实现效用最大化,而这些约束条件就是现存的制度结构。与新古典理论的传统做法相比,消费选择理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两分法被终结,替代之的是将效用最大化假设扩展到所有的个体选择。因此,言下之意,一个决策制定者,无论他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一个政府官僚、一个政客或者其他什么,都被假定为是在他所处的制度结构这样一种约束下作出自己的选择,并追逐自己的目标。

3. 个人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表明,对于“个人理性”概念上的诠释,经济学家至少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这种情况可以这样来理解。首先,一些理论家坚持传统新古典所谓的“完全个人理性”认识。这里的假设是,所有决策制定者具有一致的、稳定的偏好——无论他们是消费者,还是企业家,或者官僚。换句话说,我们能够设想出这样一个理想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所有个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有目的、有理性的最优化行为。因此:

一个完全理性的个体有能力预测到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并可以在各种可行的行为中进行评价和作出最佳选择,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一眨眼的时间内

^① 关于德国年轻历史学派(Schmoller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可参见诸如Wagner(1907, p.15)的评论:“政治经济学正演变成为描述经济和文化历史的一门学科。”

内完成,不存在任何成本。(Kreps, 1990b, p.745)。

这样一种完全(complete)或完美(perfect)的个人理性假定曾在新制度经济学早期文献中出现过,而且这种认识在代理理论、法律的经济分析以及公共选择理论中仍然占据主流地位。

为了更为接近真实世界的情况,当代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不完美个人理性**(imperfect individual rationality)。根据这一认识,决策制定者的偏好被认为是不完全的,并且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中, North(1978, p.972)尤其强调这一点。^①不过,必须肯定的是,一旦正的交易费用被引入微观经济模型,所考察的就是一个动荡不定的世界,决策制定者的认识是不应该被假定为“完全”的。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获取无止境的知识要么存在太多的费用,要么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可以容易地进一步地认识到,个体在掌握信息以及制定计划时存在有限的的能力。Simon(1957)利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一术语指代这样一个事实:决策制定者并非无所不知,而是在信息的加工方面存在着实际上的困难。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被看作是意欲理性的(intendedly rational),但是他们并非是“超级理性”的(hyper-rational)。

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较近时期的财产权理论以及经济理论的新制度研究方法均采用不完美个人理性的假设。Williamson(1985)一直强调交易费用在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他还指出,有限理性意味着所有经济交易无法由市场合约来组织。有限理性(以及交易费用不为零)是指这样一种情况,面对复杂的世界,在合约所有相关的地方做到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正如 Kreps(1990b, p.745)所说:

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试图实现最大化,但这样做的成本太高;可以在事前作出规定以应对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不可预见的或然事件,但是他无法预期所有的可能事件,而且他也知道没有这种能力。考虑到这种情况,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出现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4. 机会主义行为 本质上,决策者被认为重要的是品质(qualities)而不是理性(rationality)。例如, Brunner 和 Meckling(1977, p.71)将经济学上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模型描述为“足智多谋的、有判断力的、实现最大化的人”(resourceful, evaluating, maximizing man, 简称为 REMM)。这个特点意味着,人不仅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冷冰冰的计算机器。不仅如此,这类文献还注意到,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有魅力的或者值得信赖的。正如 Williamson(1975)所说,一些人可能会不诚实,也就是说,他们会隐瞒偏好、扭曲事实或者故意地混淆视听。这种行为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尽管有限理性阻止人们写下完全合约,但是如果经济行为人是**完全值得信赖的**,那么就可以依赖不完全合约。但是现实中,因为存在 Williamson 所说的“利用欺骗的手段进行自利”的行为,以及因为事前将机会主义者与

^① “偏好的研究——或者更为宽泛的,意识形态——的确被研究许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所忽视了;但它不能够被那些研究政治和司法过程的经济学家所忽视,也一定不能被那些研究长期处于变化的经济体制约束的经济史学家所忽视。”(North, 1978, p.973)

非机会主义者进行区分一般会涉及高昂的费用,所以复杂的合约必然会终止。

5. 经济社会 基于最为一般的观点,经济社会可以被认为是关于个人以及将认可的产权赋予社会每一成员的一系列规则或惯例。在经济学家较为宽泛的术语意义上,产权包含了使用权,获取来自有形物品、知识产品的收益权,以及对其他个体关于某种行为的要求权。后一个条件意味着,存在签约权——比如,在劳务合约或者租借合约中必须要“兑现”的承诺行为。^①当然,管理产权转让所涉及的签约权利和社会制度安排必然是社会的职责了。

特别地,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排除了运用物质力量或其他形式的强迫力量所进行的产权转让。这种传统意味着,不存在压力集团。换句话说,人们不关注那些为了改善内部成员的福利而通过诸如利用政府权威之类的手段来牺牲体制中他人利益的团体。在新古典世界中,仅仅考虑这样的团体,它的运作是根据自愿结社和自愿交易的原则,并且能够为其成员带来帕累托改进的。^②竞争以及自由选择被认为起支配作用。这样,收入(包括税收)转移就被理解为一种在合作性集体内部所进行的自愿转移。

6. 治理结构 在任何时候,一个经济体现存的产权结构是由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③或秩序(order)^④界定和保护的。后者可以被理解为一套规则体系和用来执行这些规则的工具。一般地,一个秩序可以通过“完全主观”的机制(理性价值、宗教等)或者“对具体的外部效应的预期”(Weber, 1968, p.33)来执行。制度经济学常常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况——具体而言,是通过使用法令限制个人行为的体制。这种法令本身或者是由法律或者是由惯例(包括伦理和道德的行为约束)建立起来的。

7. 制度 能够对“制度”这样一个基本概念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有诱惑力的,但是,正如 Arrow(1970, p.224)所指出的,“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应该避免不合时宜的精确性”。无论如何,在这本书中,制度将被定义为一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安排(Schmoller, 1900, p.61)。当然,制度的目的是为个人行为沿着特定的方向提供一种指引。就成功地实现这一目的而言,制度为日常生活活动提供了一种行为准绳,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North,

① Fisher(1912, p.20)是这样解释的:“律师认为产权和人权存在区别;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所有的权利都是所有权……为了逻辑上的方便,财富具有较为宽泛的定义,它甚至包括自由的人本身;对与之相关的产权也采用了比较宽泛的定义,以至于包括了司法上人们所熟知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每一束权力都是产权……产权于是就是财富的使用权或获得财富服务的权利。”这些服务必然是未来的,因而不确定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完全产权应该包含这样的内容:产权是获取财富中的一个或多个物品的一部分或全部未来服务的机会权利……财富和产权……是两个相关的术语。财富是所拥有的具体事物;而产权则是所有权的抽象权利。”

② 本质上,这是核理论的主要考虑。

③ 参见 Williamson(1979)。

④ Weber(1968, p.31)使用的术语是法律秩序(legitimate order)。其他曾经使用过的术语还包括如结构(structure)、体制(system)和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参见 Coleman(1991, p.8)。